

## 中非现代化发展道路探索的 多样性与共通性\*

张 春 王海璐

**内容提要** 由于西方现代化的整体成功，既有理论往往强调现代化的单一模式和线性进步，贬抑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并掩盖其背后的共通性。竞争性理论与实践的存在，加上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不仅凸显了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可能，更展示了多样性现代化道路的3个共通要素，即凝聚发展共识、培育发展动力和强化发展韧性。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得益于中国通过发挥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作用，从而凝聚国家发展共识；通过实现内生驱动、优化资源配置和以发展优先持续推进改革开放，从而培育发展动力；通过实行经济多样化、渐进式改革和风险预警与危机管理，从而强化发展韧性。相较而言，非洲国家拥有传统共识治理与现代民主治理的融合经验，并在协调“发展—安全—治理”三者关系、开展风险早期预警与管控等方面付诸大量实践，正在积极探索自身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尽管中国与非洲国家存在诸多国情差异，但双方围绕发展共识、发展动力和发展韧性展开现代化经验交流，可有效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推动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非洲 发展共识 发展动力 发展韧性

**作者简介** 张春，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海璐，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可谓进入21世纪甚至是自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为重大的国际事态之一。一方面，中国整体经济实力迅速

---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1年度重大招标项目“《非洲通史》（多卷本）”（LSYZD210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增长，中国 1979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 80.30%、美国的 6.79%，但到 2022 年这两个数据分别提升为 8.77 倍和 70.55%；另一方面，中国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改善，1979 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 31.31%、美国的 1.58%，到 2022 年分别提升为 7.52 倍和 16.65%。<sup>①</sup> 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 = 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为其提供了全新选择。<sup>②</sup>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凸显了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可能，更揭示了多样性的现代化道路背后的共通性基础。回顾迄今国际上主要的经济发展理论及其方案，现代化理论事实上确立的是单一模式且线性进步的现代化方案；尽管遭到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研究者的强烈反驳，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案例稀缺特别是反复遭遇挫折，使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全球化理论变相强调现代化理论的单一模式和线性进步更为便利。尽管冷战结束后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地区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理论研究者却强调发展模式的复制十分困难。<sup>③</sup> 因此，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独立迈向现代化所提供的借鉴意义，就需要揭示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人类现代化道路的共通要素，特别是在西方理论刻意放大其特殊性的背景下。惟有识别出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多样性现代化道路的共通性，才能有效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意义，并为促进其他发展中国家独立迈向现代化、推动中外现代化经验互鉴奠定坚实基础。

## 一 识别多样性现代化道路的共通性

必须承认的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取得较长时期成功的现代化实践主要发生在当今的西方发达国家。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确实突破了西方理论所蕴

---

① 笔者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 数据计算得出。

② 习近平：《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载《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

③ Chalmers Johnson,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Odyssey of a Concept”, in Cummings M. Woo e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Californi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32–60; Peter B. Evans, “Predatory, Developmental and Other Apparatuses: A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on the Third World State”, *Sociological Forum*, Vol. 4, 1989, pp. 561–587.

含的后发国家不发展理论框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自主现代化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方案”。<sup>①</sup>这一普遍意义事实上在于两方面：一是证明现代化道路存在多种可能，打破了西方理论有关现代化的宿命论和线性论；二是凸显了多样性现代化道路背后的共通性，西方理论对单一模式的强调则导致对多样性的否定，进而使探讨多样性背后的共通性变得不可能。鉴此，我们需要首先揭示既有理论否定现代化多样性的逻辑，并发现其中蕴含的现代化共通性，从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有机结合自身特殊性与现代化普遍性、独立迈向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撑，为中外现代化经验互鉴与促进共同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 （一）既有理论对现代化道路多样性的贬抑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维持甚或提高“生存质量”逐渐超越确保“生存必需”成为各国战略优先。<sup>②</sup>通过推动经济增长从而实现全面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需要强调的是，共同追求未必意味着具有相同发展道路。事实上，既有理论对现代化道路多样性的探索并不充分，特别是主要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经验的现代化理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理论更多强调发展道路的单一性；而主要以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经验为基础的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及发展型国家理论，或因作为理论基础的实践不够成功而难获认可，或因作为理论基础的实践不够普遍而被认为难以复制。整体而言，既有理论对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持贬抑取向。依据理论趋于成熟的大致时间，主要有现代化理论、依附论、世界体系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与发展型国家理论。这些理论都尝试为国家发展特别是国民经济增长提供宏观方案，涉及经济、政治及社会等多个维度。整体而言，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理论远较其他理论更为宏观，而发展型国家理论最为微观，现代化理论、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居间。依据其发展处方及具体实践，可将上述理论分为三类。

第一，现代化理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理论强调单一模式和线性进步的发展方案，事实上否定了现代化的多样化可能。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是第一个系统地探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理论，其兴起主要源于二

---

<sup>①</sup> 兰洋：《中国式现代化对后发国家不发展理论的超越》，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第1~9页。

<sup>②</sup> 潘亚玲、张春：《战争的演变：从寻求生存必需到维护生存质量》，载《国际论坛》2002年第4期，第14~21页。

战后的3个根本性事态,即美国霸权确立、共产主义扩散及去殖民化运动成功。<sup>①</sup>新独立国家对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的追求,以及东西方意识形态竞争,都使对新发展模式的需求得以凸显。<sup>②</sup>在此背景下,西方提供的现代化理论从未被局限于经济增长,而是试图提供一套涵盖政治和社会现代化的宏观理论,其深层意图是否定西式现代化道路之外的其他可能。<sup>③</sup>例如,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 W. Rostow)将现代化道路划分为5个阶段:传统社会、过渡(起飞前)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及大众消费阶段;为凸显其意识形态关切,罗斯托甚至将“非共产党宣言”作为其著作的副标题。<sup>④</sup>与此类似,塞默尔·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 Lipset)提出一种解释国家社会政治发展的内生转型理论,但并未构建社会经济发展模型;<sup>⑤</sup>其他西方学者则多从微观经济过程视角将社会进化解释为单一的宏观社会过程。<sup>⑥</sup>现代化理论被认为是一种宿命论和线性论,欧洲国家被认为代表现代化方向,其他国家处于“较低”阶段,非洲更是被贴上“野蛮”“原始”的标签;现代化意味着从落后的传统社会向进步的现代社会过渡。<sup>⑦</sup>换言之,现代化理论视角下的现代化道路是单一且线性的,并不存在多样性的可能。

新自由主义是大萧条前英、美经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复兴,但其复兴与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的发展处方未能奏效直接相关。新自由主义倡整体上不受管制的自由市场经济,认为发展不是国家战略行动的后果,而是市场力量的结果,或者说,恰恰是政府干预和市场监管过多才导致了发展失败。<sup>⑧</sup>

---

① Alvin Y. So, *Soci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Modernization, Dependency, and World-System Theor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0, pp. 17-59.

② M. Shamsul Haque, *Restructuring Development Theories and Policies: A Critical Stud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p. 72.

③ [美国]霍华德·威亚尔达:《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刘青、牛可译,牛可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

④ W. W. Rostow,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⑤ Seymour M.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3, No. 1, 1959, pp. 69-105.

⑥ Simon Kuznets,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45, No. 10, 1955, pp. 1-28; Daniel Lerner,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58.

⑦ A. Mabogunje, "Institutional Radicalization, the State, an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in Afric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A*, Vol. 97, No. 25, 2000, p. 14007.

⑧ 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Manfred B. Steger and Ravi K. Roy, *Neolibera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因此，新自由主义认为，“正确的”现代化道路是将市场从国家控制和监管中解放出来，赋予自由市场、开放经济和私有化以主导地位，使资本、商品和服务能够拥有完全的行动自由。新自由主义很大程度上是现代化理论的宿命论和线性论的复苏，其意识形态目标也相当明显，因其兴起与美国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的全球扩张高度重合。<sup>①</sup>

得益于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当代全球化进程，全球化理论框架下的发展理论强调，全球化机制特别是经济领域的一体化是迈向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全球化理论与新自由主义紧密交织，均以美欧发展模式为基础，贸易和投资全球化被认为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散密不可分。与新自由主义不同，全球化理论强调相互依赖效应可以超越国家间的政治、文化及地理等阻隔因素，特别是新技术可帮助发展中国家更为有效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以实现发展。<sup>②</sup>这意味着全球化进程特别是新技术发展，可能使民族国家丧失现代化的相关性，各国发展差异主要归因于经济和文化因素；<sup>③</sup>现代化理论的现代化道路单一论和线性论某种程度上得以再现。

第二，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是对现代化道路单一论和线性论的公开反击，但拉美国家现代化遭遇的挫折使其探索现代化道路多样性的努力大打折扣。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依附论强调，现代化理论本身具有误导性，因其掩盖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真正关系。事实上，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实现现代化，根源恰好在于发展中国家的欠发达或不发展。换句话说，发展中国家难以实现现代化的原因，并非现代化理论所强调的未能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而是世界经济体系所存在的“中心—外围”结构：发达国家居于世界经济中心，而发展中国家居于外围，中心与外围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sup>④</sup>因此，“欠发达”并不是一种原初状态，

---

<sup>①</sup> John Brohman, “Universalism, Eurocentricism and Ideological Bias in Development Studies: From Modernization to Neoliberalism”,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6, No 1, 2005, pp. 121 - 140.

<sup>②</sup> Jeffery Everett, “Globalization and Its New Spaces for (Alternative) Accounting Research”, *Accounting Forum*, Vol. 27, No. 4, 2003, p. 408.

<sup>③</sup> Giovanni E. Reyes, “Theory of Globalization: Fundamental Basis”, *Sincronia*, Vol. 6, No. 18, 2001, pp. 1 - 5.

<sup>④</sup> Andre G. Frank, *Crisis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1967; Raul Prebisch, *Towards a Global Strategy of Development*,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68; Fernando H. Cardoso and Enzo Faletto,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Ingrid H. Kvangraven, “Beyond the Stereotype: Restating the Relevance of the Dependency Research Programm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52, No. 1, 2021, pp. 76 - 112.

而是发达国家经济上剥削落后国家的结果。<sup>①</sup> 这意味着，与现代化理论强调现代化的时间性与趋同性不同，依附论以国际政治经济学为基础，侧重从结构即“中心—外围”关系上系统分析发展中国家未能实现现代化的原因，并给出了激进的体系变革方案和温和的依附发展方案。<sup>②</sup> 前者探索全新的现代化道路，后者则试图沿袭西式现代化道路。

与依附论依然强调国家或单元层次不同，世界体系论从宏观社会学的视角，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解释为全面的社会体系。世界体系论的代表学者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强调，世界体系是个文化多元但经济、社会单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因为整个体系为单一的国际分工模式所主导。这一分工体系不仅是功能性的，也是地理性的：通过不平等交换，包括边缘和半边缘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剩余价值被转移到中心也即发达国家。<sup>③</sup> 这样，边缘、半边缘国家尽管可能实现数量意义上的增长和发展，但难以实现质的突破，因此其发展不过是依附地位的再生产。<sup>④</sup> 尽管与依附论“中心—外围”结构拥有相似特点，但世界体系论更强调全球性的阶级关系；边缘对半边缘和中心、半边缘对中心的双重依赖关系，导致发展中国家整体性的现代化更为困难，尽管单个国家革命性的现代化战略仍可能获得成功。

第三，发展型国家理论得到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奇迹的支撑，但往往被认为高度特殊进而难以复制，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可能被最大程度地贬低了。发展型国家理论源于研究者对二战后日本经济增长奇迹的分析，而东亚地区的群体性发展更为这一理论提供了强大支撑。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认为，发展型国家有 4 个基本特征：拥有一个小规模的精英官僚机构，治理成本较低；官僚机构有充分自主空间且政治体系运转有效；采用国

---

① Andre G. Frank, *Crisis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1967, p. 25.

② 陈明明：《现代化论与依附论——两种旧式发展理论的再读》，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 年第 5 期，第 28 页。

③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Essential Wallerstein*, New York: The New York Press, 2000.

④ Christopher Chase-Dunn and Peter Grimes, “World-Systems Analysi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1, No. 1, 1995, pp. 387-417.

家干预的市场经济；具备一个类似日本通商产业省（MITI）的强力机构。<sup>①</sup>这意味着，发展型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国家角色。例如，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认为，发展型国家中的国家角色涵盖管理者（custodian）、创造者（demiurge）、接生员（midwifery）及放牧者（husbandry）等，尽管在此过程中国家必须保持与社会、市场等方面的嵌入性自主（embedded autonomy）地位。<sup>②</sup>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它对国家特别是官僚能力的强调与新自由主义理论相对立，因此发展型国家理论被认为是一种按照归纳法建构起来的理论，与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实践紧密关联，使其很难从案例上升为知识，进而其可复制性相对较差。<sup>③</sup>因此，尽管发展型国家理论确实揭示了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可能，但却被最大程度地贬低了。

## （二）既有理论蕴含的现代化道路共通性

尽管西方理论对现代化道路单一模式和线性进步的强调因其现代化实践的整体性成功而占据优势，但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和发展型国家理论仍凸显了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可能。尽管上述理论的价值取向存在重大差异，但基于具体实践的理论建构，事实上包括诸多共同要素。换句话说，现代化道路的单一性与多样性争论事实上也凸显了现代化道路的共通性。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这一多样性与共通性得以更为有效地展示在世人面前，可大致总结为“发展共识—发展动力—发展韧性”分析框架。

第一，发展共识，亦即塑造全社会对现代化的共同追求认知，是所有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基本政治条件。几乎所有理论都强调政治层面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现代化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发展型国家理论强调国内政治特别是政体的重要性；而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和全球化理论强调国际政治或者说国际体系的结构制约。具体而言，政治层面的上层建筑对现代化实践的根本重要性在于三方面：一是政治精英的引领角色。例如，一项主要基于西方国家现代化

---

<sup>①</sup> Chalmers Johnson,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Odyssey of a Concept”, in Cummings M. Woo eds.,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Californi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38–39; Chalmers A.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sup>②</sup> Peter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sup>③</sup> 张振华：《发展型国家研究四十年：理论贡献、不足与展望》，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2年第4期，第179～187页；牛可：《发展型国家（地区）：条件和限度》，载《世界知识》2018年第5期，第20～23页。

经验的研究认为，“发展阶级联盟”（developmental class coalition）是否存在，对发展或现代化尤其重要。<sup>①</sup> 二是发展战略的塑造。基于北欧国家现代化实践的一项研究指出，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塑造政治与经济的共生关系；但该研究最终仍回到更宏大的政治层面上层建筑，强调只有可信政体（credible polity）才可能塑造合理的国家发展战略。<sup>②</sup> 三是整个社会认知的建构。发展型国家理论强调，在政治精英、国家公职人员、国内资产阶级、劳动阶级等群体之间，必须形成有关发展的“共同项目”（common project）认知，才可能推动现代化发展。<sup>③</sup> 韩国学者李折周在总结韩国发展型国家的主要特征时也强调，围绕发展和增长达成高度社会共识，是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长期稳定运行的基础。<sup>④</sup> 国内学者张振华在考察发展型国家理论研究 40 年的历程后指出，发展型国家的 3 个要件——发展意愿、发展能力和产业政策。<sup>⑤</sup> 尽管他未使用“发展共识”这一术语，但“发展意愿”指全民共同意愿，因此事实上其内涵仍是“发展共识”。

第二，发展动力是迈向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其核心是发展中国家严重受限的发展资源的获取与利用。推动现代化进程得以启动并最终实现，是所有理论的最终落脚点，并主要关注 3 个问题：一是如何启动现代化进程，或者说是罗斯托现代化理论所讨论的如何实现“经济起飞”？现代化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全球化理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雷同，即引入现代技术和科学方法、集中发展贸易并借此实现储蓄和投资，以及有效利用外资和外援，可使发展

---

① Luiz C. Bresser - Pereira and Marc Ianoni, “Developmental Class Coalitions;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Prospects”, in Hideko Magara and Bruno Amable eds., *Growth, Crisis and Democrac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 Coalitions and Policy Regime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2017, pp. 166 - 195.

② Douglass C.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1;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and Credible Commitment”,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Vol. 149, No. 1, 1993, pp. 11 - 23; Barry R. Weingast, “Constitutions as Governance Structures: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Secure Marke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Vol. 149, No. 1, 1993, pp. 286 - 311; Francisco J. Ruge - Murcia, “Credibility and Changes in Policy Regim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3, No. 1, 1995, pp. 176 - 208; David A. Leblang, “Property Rights, Democracy and Economic Growth”,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49, No. 1, 1996, pp. 5 - 26.

③ Vivek Chibber, “Reviving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The Myth of the ‘National Bourgeoisie’”, in Leo Panitch and Colin Leys eds., *The Socialist Register 2005: The Empire Reloaded*, Vol. 41, 2005, p. 147.

④ 李折周：《韩国发展型国家模式下“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战略研究》，载《东北亚经济研究》2020 年第 1 期，第 58 - 67 页。

⑤ 张振华：《发展型国家研究四十年：理论贡献、不足与展望》，第 180 页。



中国家获得经济增长引擎。或者说，西方理论强调，启动现代化的关键在于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外生驱动。<sup>①</sup>但对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和发展型国家理论来说，必须避免国家自身发展陷入被剥削循环及过度依赖外资和外援。由此而来的第二个问题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资源相对有限，如何合理配置资源使其发挥最大效应，从而推动现代化进程，就变得极端重要。这也正是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和发展型国家理论或者强调进口替代，或者强调出口导向或战略产业政策的原因之一。但这里还存在第三个问题，即发展中国家如何能在引进外资外援与避免对外依赖之间实现平衡？或者说，如何在内生“造血”能力培育要求与外部发展环境改善压力之间实现平衡？亦即如何基于发展共识，确保国家在较长时期内始终聚焦发展？<sup>②</sup>

第三，发展韧性既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多样性现代化道路的理论生命力的基础。就既有发展理论的相互竞争性而言，以西方发达国家经验为基础的现代化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全球化理论明显占据上风。其原因根本上在于，现代化是一个长期过程，其间的变革与反复也即发展韧性的强弱，<sup>③</sup>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化进程的成败，也决定了相关理论的生命力。发展韧性的强弱首先取决于经济多样性水平，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相对单一的经济结构较难抵御内外冲击。其次，发展韧性的强弱也取决于对发展目标与发展环境的关系调适，即改革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因其可向国内外投资者展示一国迈向现代化的可信承诺，从而形成政治改革与经济良性共生；反之，如果改革不可持续，扭曲的激励可能诱发资本外逃、短期投资或其他阻碍改革与发展的行为，导致政治改革与经济恶性循环。<sup>④</sup>最后，发展

---

① Wesley M. Shrum, "Science and Story in Development: The Emergence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Agricultural Research",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Vol. 30, No. 1, 2000, pp. 95 - 124; Mark Herkenrath and Volker Borschier,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World Development: Still Harmful?", *Journal of World Systems Research*, Vol. 9, No. 1, 2003, pp. 105 - 139.

② Chalmers Johnson,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Odyssey of a Concept", in Cummings M. Woo e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p. 37.

③ Antony Giddens, *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An Analysis of the Writings of Marx, Durkheim and Max Web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37 - 138.

④ Dani Rodrik, "Promises, Promises: Credible Policy Reform via Signaling", *Economic Journal*, Vol. 99, No. 397, 1989, pp. 756 - 772; Dani Rodrik, "The Limits of Trade Policy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6, No. 1, 1992, pp. 87 - 105; Rudiger Dornbusch, "The New Classical Macroeconomics and Stabilization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0, No. 2, 1990, pp. 143 - 147.

韧性的强弱还表现为风险预警和危机管理的能力大小，由此以稳健改革和风险预警为核心的发展韧性培育颇为重要。

尽管西方理论掩盖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可能进而否定现代化道路的共通性，但竞争性理论和实践的存在，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进展，仍使这一多样性与共通性得以展示。具体而言，多样性的现代化道路的共通性主要涵盖3个维度，即发展共识凝聚、发展动力培育和发展韧性强化，这是所有国家迈向独立自主现代化时都应重视的共同要素。这3个共通性的识别，是以既有竞争性理论和差异性实践为基础，因此既源于多样性又超越多样性，它在聚焦多样性现代化道路共通性的同时，为各国迈向现代化的“独立自主”预留充分空间，不仅有利于现代化多样性道路的探索，也有利于多样性现代化实践的经验交流互鉴。

## 二 发展共识凝聚

现代化是一项历史进程，必须通过整体性努力才有可能实现。因此，任何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都需要始终致力于凝聚和维持国家发展共识。为此，政治精英必须发挥引领作用，并制定出国家现代化的战略规划，然后使其获得全社会支持，上升为国家共识。中非发展共识凝聚经验交流空间广阔：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共识凝聚中的先锋队作用；非洲大陆和国家往往制定了完善的发展战略，但仅部分国家实现了传统共识治理与现代民主治理的有机结合，仍有部分国家面临社会支持不够充分的挑战。

### （一）精英引领能力的建设

引领与凝聚国家发展共识的精英力量通常以政党形式出现，因此，西方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所特有，非洲国家难以效仿。<sup>①</sup>但这一论调的根本错误在于，它将重点置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政党在操作层次的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而刻意忽视其凝聚国家共识的核心功能。同理，美欧对非洲政党政

---

<sup>①</sup> Wenwei Guan, “Beijing Consensus and Development Legitimacy: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Regime from a Law &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Asi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Vol. 12, No. 1, 2017, pp. 115–139; Mustafa Yagci, “A Beijing Consensus in the Making: The Rise of Chinese Initiatives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Perceptions*, Vol. 21, No. 2, 2016, pp. 29–56.

治的误导也在于，本末倒置地强调政党的法律合规、内部组织及选举获胜等方面，刻意忽视政党凝聚国家共识的核心功能。<sup>①</sup> 非洲有着悠久的共识治理传统，与现代民主治理的有机结合有助于政治精英引领能力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坚持通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团结全社会精英。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要求政党制度必须具备强大的社会整合能力。中国始终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其关键在于：共产党始终是社会整合的中坚力量，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扩大了社会整合的边界和张力，体现出强大的社会整合力。如同习近平主席在 2023 年 1 月 6 日同党外人士座谈时所强调的，“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始终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团结奋斗，是多党合作的根本政治基础”，各民主党派的政治责任就是“传承政治薪火、深化政治共识，始终保持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政治本色”，在凝心聚力、服务大局上发挥更大作用，动员激励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而团结奋斗。<sup>②</sup>

非洲有着悠久的共识决策传统，以长老为代表的传统政治精英长期发挥着引领作用。通过开放性的社区会议或部落会议等机制，共识治理的基本特征是透明的参与式治理，避免权力集中于单一机构或个人，其代表性机制是因地制宜的长老会议。<sup>③</sup> 在共识治理下，意见矛盾甚至争端冲突一般是通过谈判解决，而不是经由必然产生赢家和输家的对抗性程序解决。尼日利亚东部的伊博（Ibo）村议会、厄立特里亚的拜托（Baito）村议会、肯尼亚基库尤人的长老委员会（kiama）、肯尼亚海岸米吉肯达（Mijikenda）的卡亚（kaya）长老以及北非柏柏尔人的长老会议制度，都是传统共识治理的典型例子。尽管人口增长、科层制发展等使共识治理应用于国家层面日渐困难，但它仍不失为基层治理的重要方法。它不仅有助于解决和管理与国家多样性相关的各类冲突或矛盾，还可缓解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的各类争端。大多数非洲国家

---

<sup>①</sup> Taiwo A. Olaiya, “Party System, Its Peculiarities and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Practices in Nigeria”, *Af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0, No. 10, 2016, pp. 119 - 130.

<sup>②</sup> 习近平：《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履职尽责 在凝心聚力服务大局上发挥更大作用》，载《人民日报》2023 年 1 月 17 日。

<sup>③</sup> Asmarom Legesse, *Gada: Three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African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73; Asmarom Legesse, *Oromo Democracy: An Indigenous African Political System*, New Jersey: The Red Sea Press, 2000.

独立后都实现了传统共识治理与现代民主治理的有机结合，使政治精英的引领能力得到明显提高。与此同时，西式民主治理模式的引入也使部分非洲国家陷入传统与现代的调适困境，政治精英的引领能力建设面临严峻挑战。在全面引入现代民主政治的同时，非洲多国面临政治现代化、国家建构、民族建构等不够充分的难题，使“赢者通吃”压倒共识治理，传统长老难以有效发挥作用。<sup>①</sup>一方面，前殖民宗主国在殖民时期便设法破坏共识治理机制，如英国曾在中央权威之外任命独立的所谓“发明的酋长”（invented chiefs）和“国家奉养的长老”（state-paid elder），以取代传统的酋长或长老。这些尝试尽管整体上失败了，但仍对相关国家的治理产生了负面影响，如索马里的长老（Aqils）和肯尼亚的酋长制。<sup>②</sup>另一方面，西式对抗政治与非洲当地的种族多样性相结合，使非洲国家的政党国家化面临严峻挑战。例如，尽管肯尼亚自1963年独立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个民主国家，但无论是1963~1991年间的一党执政还是1991年后的多党制，都带有明显的群族特征，而这正是2007年肯尼亚大选后全国性骚乱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sup>③</sup>

综上，非洲国家在融合传统共识治理和现代民主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功与存在的缺陷，不仅可为非洲自身也可为中国带来借鉴，而发挥中国共产党在凝聚国家发展共识方面的先锋队作用与经验也值得同非洲国家分享。其关键在于，政治精英不仅应引领塑造国家发展战略，更要引领整个社会对最终利益形成共同认知，从而共同追求现代化目标。<sup>④</sup>

## （二）国家发展战略的塑造

发展战略是发展共识的明确体现，同时也是发展共识得以凝聚的有形载体。尽管中非政治精英引领能力建设存在差异，但均围绕发展战略塑造取得了重要进展。无论是中国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或更为具体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

<sup>①</sup> Browne Onuoha, “Power, Conflict and Consensus Building in Africa: Ideology Revisited”, *African Journal on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11, No. 2, 2011, pp. 8-31.

<sup>②</sup> Beverly Gartrell, “British Administrators, Colonial Chiefs, and the Comfort of Tradition: An Example from Uganda”, *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 26, No. 1, 1983, pp. 1-24.

<sup>③</sup> “Kenya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Post Election Violence (CIPEV)”, Final Report, October 16, 2008, <https://reliefweb.int/report/kenya/kenya-commission-inquiry-post-election-violence-cipev-final-report>, 2023-06-10.

<sup>④</sup> Kwasi Wiredu, “Democracy and Consensus in African Traditional Politics: Plea for a Non-Party Polity”, in Emmanuel C. Eze ed., *Postcolonial African Philosophy: A Critical Reader*,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7, pp. 304, 306.

还是非盟《2063年议程》，抑或非洲大多数国家制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都明确表明中国和非洲的政治精英在塑造国家发展战略方面付出了不懈努力。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持续深化对实现现代化战略的塑造。整体上，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主要经历了“四个现代化”目标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发展，二者的衔接或重叠是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随着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小康社会的成功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又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即分两步走，到21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sup>①</sup>

非洲大陆在发展战略塑造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大多数国家拥有相对完善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在国家层面，非洲国家制定了自身迈向现代化的战略规划；对于部分发展战略规划能力相对较弱的国家，非盟则派驻国家工作队帮助其制定国家发展战略。非洲各国主要基于3个要素凝练自身的发展战略：一是本国战略优先，二是对接非盟《2063年议程》，三是关切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表明非盟《2063年议程》是非洲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载体，非洲国家自身发展战略同时也是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非盟《2063年议程》的载体。例如，南非于2012年公布其指导未来发展的《2030年国家发展规划》，其根本目标便是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一致的消除贫困与减少不平等，强调这是整个国家的战略规划，要求政府和社会力量共同推动。<sup>②</sup>又如，埃塞俄比亚即使面临内部治理困难，仍于2020年出台了2021~2030年的十年发展规划。该规划与全球和地区发展规划有效对接，旨在使埃塞俄比亚成为“非洲繁荣的灯塔”，但也强调从贫困转向繁荣需要长时间的努力和全社会的支持。<sup>③</sup>在大陆层面，非盟在非统成立50周年之际即2013年正式推出了非盟《2063年议程》，设定了非洲至2063年的发展目标，涵盖非洲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地区一体化发展等七大愿景。<sup>④</sup>为确保

---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1页和第24页。

②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Our Future – Make It Work: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 2030*, Pretoria, 2012.

③ Federal Democratic Republic of Ethiopia, *Ten Years Development Plan: A Pathway to Prosperity, 2021 – 2030*, Addis Ababa, 2020.

④ African Union, *Agenda 2063: The Africa We Want, Popular Version, 3<sup>rd</sup> Edition*, Addis Ababa, Ethiopia, January 2015, p. 2.

这一发展共识的落实，非盟一方面将七大愿景细分为20个目标、38个优先领域，另一方面将50年战略划分为5个十年执行规划。<sup>①</sup>

中国与非洲大陆和国家在发展战略塑造方面存在明显的路径差异：中国更多基于自身发展的既有轨迹，在充分虑及国际潮流的基础上塑造自身中长期发展战略；相比之下，由于经济体量较小、易受外部事态影响，非洲国家更加注重将自身发展目标与全球和地区性发展议程相互对接，通过“一个框架多项议程”模式设定自身中长期发展战略。中非发展战略塑造的差异性，进一步印证了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可能，也蕴含着重大的多样性现代化实践经验交流互鉴空间。

### （三）社会共同认知的培育

政治精英引领下塑造的国家发展战略，必须得到全社会的充分支持，才能真正转化为国家发展共识，并得到有效落实和长期坚持。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其成功的秘诀之一就在于全社会的共同认知和高度支持。社会支持对非洲国家独立迈向现代化同样重要，尽管培育社会共同认知对非洲国家而言仍存在重大挑战。

中国式现代化得以成为国家发展共识的根本原因在于，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放在首要位置。党纲明确强调，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为崇高理想奋斗和为中国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完成党的各项工作和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永不脱离群众，与群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盐同咸、无盐同淡。<sup>②</sup>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庆祝建党100周年大会上所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sup>③</sup>

---

① 有关非盟《2063年议程》的具体内涵及执行现状等情况，可参见非盟网站（<https://au.int/agenda2063>）相关信息。

② 习近平：《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突出重点》（2021年2月20日），载习近平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512页。

③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载习近平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第9页。

埃塞俄比亚已故总理梅莱斯·泽纳维 (Meles Zenawi) 曾说, 要实现独立自主的现代化, 就必须“一心一意追求共同增长和超越式发展”, 通过塑造全国性共识使其“发展议程占据主导地位”。<sup>①</sup> 尽管如此, 非洲国家在培育社会共同认知方面仍面临诸多问题。一方面, “有增长无发展”的挑战在非洲国家中较为普遍, 因为发展不足导致资源不充分, 难以实现有效的均衡分配。<sup>②</sup> 即使是在埃塞俄比亚, 资源分配高度不均也是族群间矛盾积累并最终升级的重要原因。例如, 2019 年埃塞俄比亚各主要州所获得的财政资源及相应的人均开支差距巨大: 就联邦拨付占本州财政资源的比例而言, 提格雷州高达 41%, 而奥罗莫州、阿姆哈拉州和南部各民族州分别为 26%、25% 和 17%; 就人均支出而言, 提格雷州高达 1 443 比尔<sup>③</sup>, 而奥罗莫州、阿姆哈拉州和南部各民族州分别为 733 比尔、880 比尔和 311 比尔。<sup>④</sup> 因此, 尽管埃塞俄比亚在梅莱斯总理时期获得了较快发展, 但对国家发展战略的社会支持并不稳固, 进而在梅莱斯总理去世后呈加速崩溃态势。由此而来, 埃革阵作为埃塞现代化的先锋队作用遭到严重质疑, 整体国家发展共识也陷于崩溃<sup>⑤</sup>, 甚至危及国家的中长期发展前景。另一方面, 西方理念在非洲社会层面有大量拥趸, 其中尤以非政府组织为最。客观地看, 非政府组织在非洲发展中扮演着多样性角色, 可依据其活动领域与基本目标大致分为四类——发展促进者、桥梁建设者、危机缓解者及麻烦制造者。但是, 绝大多数非洲非政府组织的理念和资金都来自外部特别是西方。而外部资金的意识形态导向往往使非洲非政府组织更多聚焦人权、问责、教育等领域, 而对经济和民生问题关注不够。<sup>⑥</sup> 这样, 输入型非政府组织往往放大了非洲各国的政治不稳定、经济不发达等问题, 使

---

① Meles Zenawi, *African Development: Dead Ends and New Beginnings*, Preliminary Draft, chap 21.2, [http://www.ethiopian-treasures.co.uk/meleszenawi/pdf/zenawi\\_dead\\_ends\\_and\\_new\\_beginnings.pdf](http://www.ethiopian-treasures.co.uk/meleszenawi/pdf/zenawi_dead_ends_and_new_beginnings.pdf), 2023-10-20.

② 安春英:《非洲经济增长与减贫发展的悖论——兼论非洲从贫困化增长到益贫式增长范式的转变》, 载《西亚非洲》2010 年第 3 期, 第 20~26 页。

③ 2019 年 1 美元可兑换 29.11 比尔。

④ Jos Meester, “The Struggle Over Political Finance in Ethiopia’s Transition”, *Clingendael*, February 3, 2021, <https://www.clingendael.org/publication/struggle-over-political-finance-ethiopia-transition>, 2023-06-10.

⑤ 周瑾艳:《作为非洲道路的民主发展型国家——埃塞俄比亚的启示》, 载《文化纵横》2019 年第 6 期, 第 36 页。

⑥ Steven Lawrence, “The Africa Funding Landscape: A Profile of Funders Focused on Africa and Perspectives on the Field”, Washington, D. C.: Africa Grantmaker’s Affinity Group (AGAG), 2019, p. 10.

国家发展共识难以有效凝聚。<sup>①</sup>

当然，仍有不少非洲国家的发展战略在特定时间内获得了较高的社会支持，并推动这些发展型国家的成长。中非发展共识凝聚过程中的共性和差异，尽管与政治精英的引领能力密切相关，但也与国家是否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发展的可持续性高低等有关；或者说，发展共识凝聚并非独立的，而是与发展动力、发展韧性等方面紧密相关。

### 三 发展动力培育

现代化蕴含着进步与发展，而任何国家在启动现代化的最初阶段，都可能面临资源不足的限制，因此，一国独立迈向现代化的关键便是培育可持续的发展动力。它大致涵盖三方面内容：一是实现内生驱动，聚焦独立性发展动力的培育，避免陷入依附论的“中心—外围”或世界体系论的“边缘—半边缘—中心”的不平等结构之中；二是优化资源配置，强调突破性发展动力的培育，实现有限资源的效用最大化；三是以发展优先持续推进改革开放，致力于持续性发展动力的培育，实现有限资源在发展、安全和治理等部门的合理分配。

#### （一）实现内生驱动

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的最大理论价值在于，它们揭示了现代化理论的宿命论和线性论谬误，指出发展中国家迈向现代化就必须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其前提是实现内生驱动型发展。中国和非洲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均表明，内生驱动型发展是国家获得真正属于自身的发展动力的前提，可为更为长期的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成功经验就是走自己的路，实现内生驱动型发展。早在 1979 年，邓小平就明确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sup>②</sup>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口号。习近平主席在谈到中国式现代化时，强调其核心在于秉持独立自主原则，探索现代化道

---

<sup>①</sup> 相关讨论可参见张春：《非洲政治治理 60 年：多重长期困境与潜在创新出路》，载《西亚非洲》2020 年第 2 期，第 66~90 页。

<sup>②</sup> 邓小平著：《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63 页。



路的多样性。他指出，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不能搞简单的千篇一律、“复制粘贴”。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sup>①</sup> 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奥秘之一在于，中国通过内生驱动型发展走出了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追求独立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全新思路。

非洲国家在取得政治独立后纷纷致力于经济独立，发展型国家模式被证明是最有可能帮助非洲国家实现独立自主和内生型发展的方法。<sup>②</sup> 例如，加纳、坦桑尼亚和毛里求斯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一度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发展成效，而埃塞俄比亚则是冷战结束后特别是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的非洲发展型国家代表。梅莱斯总理曾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模式在非洲是行不通的；如果没有国家推动或有效的发展型国家，欠发达的经济体无法推动国家发展。<sup>③</sup> 尽管发展型国家模式在非洲遭遇过至少两次反复，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非经委”）在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仍倡导非洲国家采取发展型国家发展模式；认为新自由主义理论所强调的自由市场理论并非唯一的发展机制，在发展中国家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家应当发挥重要作用。<sup>④</sup> 在发展型国家模式之外，非洲国家也在寻求从其传统智慧中寻找内生驱动型发展的启迪。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非洲多国兴起一股“回归传统”（retraditionalization）的潮流，强调通过自下而上的自我确认及自上而下的国家吸纳等方式寻找传统，为其独立发展提供思想支撑。<sup>⑤</sup> 这一“回归传统”潮流今天仍在持续。根据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2008 年启动的一项系列调查，传统权威在非洲多国仍然很强大，尤其是非洲公众高度认可传统权威在社区治理、发展

①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2023 年 3 月 15 日，北京），载《人民日报》2023 年 3 月 16 日。

② [赞比亚] 恩琼加·迈克尔·穆里基塔：《在非洲创建胜任的发展型国家：实现非洲 2063 议程的基本动力》，载《非洲研究》2015 年第 1 期，第 69～73 页。

③ Peter Gill, “Meles Zenawi: In His Own Wor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ugust 22, 2012, <https://blog.oup.com/2012/08/meles-zenawi-in-his-own-words>. 转引自周瑾艳：《作为非洲道路的民主发展型国家——埃塞俄比亚的启示》，第 30 页。

④ UNECA, *Economic Report on Africa 2011: Governing Development in Africa –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ddis Ababa: UNECA, 2011.

⑤ Helene Maria Kyed and Lars Buur, “Introduction: Traditional Authority and Democratization in Africa”, in Lars Buur and Helene Maria Kyed, eds., *State Recogni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A New Dawn for Traditional Authoriti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 2.

促进、土地分配等方面的角色与作用。<sup>①</sup>与此同时，由于非洲国家普遍经济体量较小，因此通过团结合作实现共同的内生驱动型发展便相当重要。非盟（及其前身“非统”）一直在努力推进非洲地区至大陆的渐进性一体化。经过多年发展，非洲国家的一体化水平有了明显提升。根据非盟、非洲开发银行和非经委共同开发的非洲地区一体化指标，截至 2019 年底，非洲已有 25 个国家达到中等一体化水平（得分区间为 0.33 ~ 0.66），尽管仍有 29 个国家处于较低水平（得分区间为 0 ~ 0.33 分）；需要强调的是，作为整体的非洲即将迈入中等水平，2019 年得分达到 0.327 分。<sup>②</sup>

尽管非洲国家的内生驱动型发展道路探索已取得一定进展，但仍受经济体量、历史联系、国际体系等因素制约，部分非洲国家对如何实现内生驱动的思考仍不够充分，易受西方误导。例如，非洲当前的债务风险更多与投资回报周期均较长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关，要求实现债务积累与基础设施发展的合理平衡，但在西方“债务陷阱论”蛊惑下，不少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陷于停滞。中非开展独立发展道路探索与坚持的经验交流互鉴正变得日益迫切。

## （二）优化资源配置

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资源总体上高度有限，如何有效利用有限资源变得十分重要。因此，任何旨在实现独立自主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均需优化资源配置，特别是通过集中资源于关键领域，争取在短期内取得重大突破，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中国一贯强调优化资源配置，通过以点带面最终带动整体性的国家发展。例如，在脱贫攻坚的发展共识指引下，中国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方式，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到 2020 年底，中国实现现行标准下 9 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 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提前 10 年实现了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sup>③</sup>又如，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科技竞争和打压，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

<sup>①</sup> Carolyn Logan and Kelechi Amakoh, “African Citizen’s Message to Traditional Leaders: Stay in Deelopment, Stay Out of Politics”, *Afrobarometer Dispatch*, No. 548, 2022, pp. 4–8.

<sup>②</sup> 具体数据可从非洲地区一体化指标网站（<https://www.integrate-africa.org/rankings/all-africa>）获取。

<sup>③</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2021 年 4 月），载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21-04/06/c\\_1127295868.htm](http://www.xinhuanet.com/2021-04/06/c_1127295868.htm)，2023-12-13。

围绕国家战略需求，优化配置创新资源，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大幅提升科技攻关体系化能力，在若干重要领域形成竞争优势、赢得战略主动。<sup>①</sup>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西方几百年才有的现代化成果，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sup>②</sup>

非洲国家也始终在探索更好的资源配置方式，其典型是设立经济特区并将其打造为经济增长极，再通过其辐射带动作用以实现系统性的经济增长。<sup>③</sup>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显示，在冷战结束后的20年中，设立经济特区的非洲国家从37个增至54个；整个大陆的经济特区从1990年的20个增至2020年的237个，其中最多的是肯尼亚（61个），尼日利亚（38）、埃塞俄比亚（18）和埃及（10）紧随其后。<sup>④</sup>在大陆层面，为使非盟《2063年议程》得以有效落实，非盟确立了15个旗舰项目，并将发展资源优先放在非洲大陆自贸区（AfCFTA）、非洲大宗商品战略、非洲高速铁路网及非洲单一航空市场等项目上。其中，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是非洲优化资源配置的典型体现。非洲大陆自贸区旨在通过加强非洲在全球贸易谈判中的共同话语权和政策空间，加快非洲内部贸易，提高非洲在全球市场的贸易地位，加快区域和非洲大陆一体化进程。建成之后，非洲大陆自贸区将是全球最大的巨型自贸区，覆盖54个国家13亿人口，其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4万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评估，非洲大陆自贸区的全面推进将使非洲大陆的真实收入到2035年增长7%，相当于4450亿美元（按2014年价格计算）；到2035年，非洲大陆自贸区的运行还会为非洲以外世界带来760亿美元的额外增长，相当于为全球经济增长额外贡献0.1个百分点。具体到贸易一体化，到2035年，非洲大陆自贸区将促进出口增长29%，进口增长7%，且不会对非成员国的贸易带来消极影响。<sup>⑤</sup>非洲大陆自贸区对大陆内部贸易的增长促进有重要意义，据估计，到

---

① 《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全面加强资源节约工作》，载《人民日报》2022年9月7日。

② 郝永平、黄相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成就“中国之治”》，载《人民日报》2020年3月13日。

③ Arkebe Oqubay, “African Industrial Hubs and Industrialization: Diversity, Unevenness and Strategic Approach”,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Vol. 29, No. 1, 2022, pp. 1–40.

④ UNCTAD, *Handbook on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Africa: Towards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across the Continent*, New York: UNCTAD, 2021, pp. 35–37.

⑤ World Bank Group, *The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Economic and Distributional Effects*,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Group, 2020, pp. 43–51.

2045 年，大陆内部贸易可能比没有自贸区的情况高出 34%。<sup>①</sup>

从优化资源配置的具体举措看，中非有着一定相似性：双方均未采取选择性的战略产业政策，而是采用行业集成或地理集成的突破方法，力求在较短时间内将有限资源的效用最大程度地予以发挥，通过以点带面的突破带动整个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但由于非洲国家大多实行多党制，各党派利益和政见不同，国家间或一国内部存在民族与社会矛盾，使资源配置难以取得预期效果。

### （三）以发展优先持续推进改革开放

发展中国家独立迈向现代化，需要持续推进改革开放。在此过程中，需要进行自身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通过开放市场、改善营商环境而吸引更多外来资本，同时也应避免形成对外依赖。值得注意的是，提供外资、外援的国际组织或国家注重优先改善安全和治理表现，但这可能分散东道国的发展资源。因此，对发展资源相对有限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确保内生驱动所需的必要资源，避免外部对改善发展环境的压力所造成的干扰，对现代化道路的成功至关重要。换言之，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在于改革开放的持续赋能，要求以发展优先为核心，实现有限资源在发展、安全和治理等部门的合理分配，这是发展中国家解决发展动力不足的重要保障。

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秘诀之一是进行改革开放。习近平主席强调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 100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sup>②</sup>“要坚持用改革开放这个关键一招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sup>③</sup>那么，改革开放应当怎样进行？“必须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毫不动摇坚持发展是硬道理。”<sup>④</sup>这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余年积累的宝贵经验之一。自 1979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坚持通过改革改善自身的营商环

---

① UNECA, “Implementing the AfCFTA Agreement will Boost Intra - African Trade and Industrialization”, January 18, 2023, <https://uneca.org/stories/implementing-the-afcfta-agreement-will-boost-intra-african-trade-and-industrialization2023-02-18>.

② 《习近平：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载《人民日报》2012 年 12 月 12 日。

③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强调 增强土地要素对优势地区高质量发展保障能力 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载《人民日报》2024 年 2 月 20 日。

④ 习近平：《改革开放四十年积累的宝贵经验》（2018 年 12 月 18 日），载习近平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 年版，第 186 页。

境以吸引更多外资。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在 2005 ~ 2019 年间，全球各经济体共推出 3 847 项改革举措，中国以 42 项位居第二，仅次于印度（48 项）。<sup>①</sup>正是得益于重大的市场改革举措，中国自 1992 年起对外资的吸引力明显增强，1992 ~ 2016 年间，外资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均值达到 3.87%。<sup>②</sup>中国对外资长期保持着较强吸引力，正是通过改革开放获得了中国经济发展急需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实现了自身经济的快速增长。由此，中国逐渐培育起可持续的造血能力，使“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的逻辑得以真正实现。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合理平衡，为中国坚持发展优先、培育发展动力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相对而言，由于发展资源严重受限，非洲国家经济发展对外资和外援有迫切需求。在西方国家看来，非洲的欠发展是由于安全不够和治理不佳所导致，必须将主要资源投入安全和治理部门，否则将始终难以发展。在“发展条件优先论”影响下，西方国家对非资金投入相当部分流向安全与治理部门，而非发展部门。这意味着外资和外援投入发展这一具备再生产能力的部门的资源被大幅压缩，非洲国家自身发展动力始终难以真正培育起来。事实上，众多非洲国家自 20 世纪 80 年代始相继进行了市场化改革，持续对外资放宽市场准入，以期通过更大的市场开放度来吸引更多外资。但由于非洲国家往往屈服于来自西方的外资或外援方对改善发展环境的压力，发展的优先地位时常发生动摇，最终难以促进自身生产力的发展。例如，以外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连续超过 2% 为标准，自 1979 年以来非洲表现较好的国家是博茨瓦纳、毛里求斯和坦桑尼亚。被认为是非洲发展型国家代表之一的博茨瓦纳，曾在 1979 ~ 1987 年和 2002 ~ 2009 年这两个时段吸引到大量外资，这两个时段其外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比例分别达到 6.56% 和 4.77%；毛里求斯在 2007 ~ 2022 年间仅 3 个年份低于 2%，但最低年份也达到 1.8%，平均达到 3.14%；坦桑尼亚则是在 1995 ~ 2015 年的 21 年间仅 1 年低于 2%，平均达到 3.30%。<sup>③</sup>这些国家在外资大量流入时期，均取得较为明显的发展；但在外资流入量减少时，其发展就差强人意，说明外资在助力提升非洲国家发展动力

---

① 具体数据可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网站 (<https://archive.doingbusiness.org/en/doingbusiness>) 获取。

② 笔者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 数据计算得出。

③ 同上。

的可持续性方面仍需要大幅改善。

需要强调的是，中非双方均高度重视改革开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强调的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与西方和非洲强调的“发展—安全—治理”关联事实上相通甚至是相同的，这为中非现代化道路的经验交流互鉴创造了条件：发展都指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全面发展；“稳定”与“安全”属于同义词，但“稳定”的门槛相对更低；“改革”是“治理”的动词，改革的目的是提高治理效率，也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sup>①</sup>因此，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发展优先”以保障发展动力的可持续性经验，不仅可与非洲发展型国家相互交流，也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独立迈向现代化提供参照。

## 四 发展韧性强化

从来没有一帆风顺的现代化道路，外部冲击和内部风险均可能导致发展进程的受挫甚至中断。在迈向现代化的征途上，所有国家都必须克服种种内外危机，不断提升发展韧性，具体涵盖 3 个要素：一是以经济多样化战略分散风险，提升抗风险能力；二是以渐进性改革和增量式改革确保稳定，塑造改革良性循环；三是以居安思危的底线思维强化预防，培育危机预警和风险管理能力。

### （一）经济多样化战略

发展韧性的提升，关键在于避免陷入依赖甚至不平等结构，包括内部的单一经济结构和外部投资与援助依赖。因此，经济多样化战略高度重要，既要在国内建立尽可能多样化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又要在对外合作中实现合作伙伴抑或外部资源来源的多样化。

尽管在 1949 年建国之初一穷二白，中国的确在短短的 70 余年时间里从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发展为一个具备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的所有工业门类。新中国成立后，不仅实现了经济多样化，而且迅速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1952 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仅有 349 亿元，到 1979 年即改革开

---

<sup>①</sup> 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年版，第 47 页。

放启动时也仅为4 237亿元，但到1990年便迅速增至近2.4万亿元，2000年增至8.5万亿元，2010年达到近70万亿元，2020年达到110万亿元。<sup>①</sup>在国内经济体系逐渐完善的同时，中国的国际经济伙伴也日益多元。中国已经是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是越来越多国家的主要投资来源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中国已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举办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立了20多个专业领域多边合作平台。2013~2022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出口总额累计19.1万亿美元（年均增长6.4%），双向投资累计超过3 800亿美元，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完成营业额累计分别达到2万亿美元和1.3万亿美元。<sup>②</sup>

同样，实现经济多样化是非洲大陆和国家的长期追求，体现在非盟推进地区一体化进程以及非洲各国经济发展战略或政策取向等方面，如埃塞俄比亚确立了2020~2030年发展规划的经济多样性目标<sup>③</sup>。但由于历史原因，非洲部分国家仍存在较为明显的单一经济结构，主要有3种表现形式：一是资源富集国主要依赖资源出口，极易陷入所谓“资源诅咒”；二是部分国家在殖民时期被强制实施单一经济，迄今仍对特定产业经济较为依赖；三是资源贫乏且缺乏经济作物的国家则容易陷入“援助依赖”。非洲国家经济结构单一最突出地体现为对大宗商品出口的依赖。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界定，任何国家如果特定大宗商品出口占有所有出口商品价值的60%以上，就属于大宗商品依赖型国家；非洲有高达83%的国家属于这一类型，占全球的45%。具体而言，非洲国家主要出口三类产品，即农产品、矿产品、石油和天然气。在非洲54个国家中，单一初级产品出口占有所有出口商品价值70%以上的国家多达45个。<sup>④</sup>经济结构的单一使非洲高达80%以上的人口在非正式经济部门就业，劳动生产率不增反降——从1960年的11.9%下降至2017年的7.7%。<sup>⑤</sup>经济

① 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统计年鉴》：<http://www.stats.gov.cn/sj/ndsj>，2024-02-18。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2023年10月），载《人民日报》2023年10月11日。

③ Federal Democratic Republic of Ethiopia, *Ten Years Development Plan: A Pathway to Prosperity, 2021-2030*, Addis Ababa, 2020.

④ UNCTA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rica Report 2022: Rethinking the Foundations of Export Diversification in Africa*, Geneva: UNCTAD, 2022, pp. 7-8.

⑤ Zainab Usman and David Landry,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in Africa: How and Why It Matters”, Working Paper,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pril 2021.

结构单一也使非洲不少国家严重依赖外资和外援。

尽管中国与非洲国家经济规模差异明显，但作为整体的非洲仍充满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希望。因此，中国与非洲国家的部门性经验交流互鉴、与非洲大陆的整体性合作，对于改善非洲大陆和国家的发展韧性高度重要。

## （二）渐进式改革方法

现代化是个长期进程，始终与改革相伴随；改革的良性循环是发展韧性的重要保障。尽管不是必然，改革的循序渐进与其良性循环高度相关；过于激进的改革往往容易引发强烈反弹，进而诱发改革失败的恶性循环。尽管中国与非洲国情不同，但对改革节奏的把握或追求改革的良性循环却是相同的。

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系统观念，强调“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方法。习近平主席一贯强调，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推进改革发展、调整利益关系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sup>①</sup> 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这种渐进式改革，避免了因情况不明、举措不当而引起的社会动荡，为稳步推进改革、顺利实现目标提供了保证。“摸着石头过河”，符合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过程，符合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不能说改革开放初期要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再摸着石头过河就不能提了……要采取试点探索、投石问路的方法，取得了经验，达成了共识，看得很准了，感觉到推开很稳当了，再推开，积小胜为大胜。<sup>②</sup> 与摸着石头相配套的稳打稳扎方法，是始终坚持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的合理平衡；“共享”成为最基本的发展要求，“有形之手”不仅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sup>③</sup>

非洲各国发展情况各异，推进改革方式与效果亦不同。非洲发展型国家的政府往往对政权掌握较为稳固，并不存在对改革可能被终结的担忧，因此

---

<sup>①</sup>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20～21 页。

<sup>②</sup>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年版，第 6～7 页。

<sup>③</sup>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纪实》，载《人民日报》2016 年 1 月 4 日。



改革举措也相对稳健。例如，卢旺达、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等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稳定的治理预期。卢旺达政府自1995年起全心致力于国家经济发展，先后于2000年和2016年颁布了《远景2020》及《远景2050》，旨在带领卢旺达在2020年、2035年及2050年依次迈入中低、中高及高收入国家行列。得益于日趋稳定的政治形势和渐进性的改革举措，卢旺达的发展型国家建设取得明显成就。<sup>①</sup>当然，也有部分非洲国家执政者将政党竞争从共识凝聚手段歪曲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在推进改革时往往首尾不顾、急功近利，极易陷入改革的恶性循环之中。此外，非洲国家改革的良性循环不仅会受政党政治影响，也可能受所谓“雄心政治”的影响。纵观非洲国家独立60余年的历史，大陆和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不可谓不多，但为数不少的战略规划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原因有时也在于战略目标过于宏大。例如，非盟《2063年议程》提出雄心勃勃的“2020年消弭枪声”计划被证明过于宏伟，不得不将实现期限延至2030年。又如，为解决发展动能不足问题，非盟提出建设四大金融机构的目标：到2016年成立非洲投资银行和泛非证券交易所，到2018年建立非洲货币基金，到2028年或2034年建立非洲中央银行。<sup>②</sup>这一目标同样雄心勃勃，在2019年非盟第一次评估《2063年议程》第一个十年执行规划进展时，该目标的建设进度被认为已实现92%。但到2021年第二次评估时，这一目标的实现水平变为“无法评估”<sup>③</sup>，暗示该目标实现具有相当难度。

中非国家因经济规模不同，对渐进式改革方法的敏感度存在天然差异，非洲国家体量相对较小，进而改革步伐可能较快。因此，改革经验的交流互鉴不仅有助于双方进一步巩固自身改革共识，更有助于理解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可能。

### （三）风险预警与管控能力

理论只有得到现实的支持，才能具备长期生命力。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和发展型国家理论，均面临现实支撑的稳固性或可持续性问题的，导致理论的

---

<sup>①</sup> 姜璐、祝若琰：《产业政策、国家能力与发展意愿——卢旺达发展型国家模式初探（1994年至今）》，载《区域与全球发展》2022年第4期，第95~118页。

<sup>②</sup> African Union, *Agenda 2063: The Africa We Want, Popular Version*, 3rd Edition, Addis Ababa: African Union, 2015, p. 16.

<sup>③</sup> African Union, *First Continental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genda 2063*, Johannesburg: AUDA-NEPAD, February 2020, p. 9; African Union, *Second Continental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genda 2063*, Johannesburg: AUDA-NEPAD, February 2022, p. 4.

生命力大打折扣。因此，预警与管控现代化过程中的风险，是避免发展大起大落、提升发展韧性的又一关键。

中国式现代化得以成功的重要保障，便是中国政府高度关注发展过程中的风险预警与控制。一方面，中国认识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一以贯之的战略决心和战略定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要增强战略的前瞻性，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敏锐洞悉前进道路上可能出现的机遇和挑战，以科学的战略预见未来、引领未来。<sup>①</sup>另一方面，中国国家领导集体始终保持着清醒头脑，反复强调要居安思危，要有前瞻性的风险意识。首先，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其次，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sup>②</sup>再次，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注重堵漏洞、强弱项，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sup>③</sup>最后，要高度重视并及时阻断不同领域风险的转化通道，避免各领域风险产生交叉感染，防止非公共性风险扩大为公共性风险、非政治性风险蔓延为政治性风险。<sup>④</sup>正是在上述理念引领下，为应对国际发展环境尤其是全球贸易格局的重大变化，中国实施了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诸多经济举措。

由于自身发展一直面临较为严峻的安全挑战，非洲国家也将风险预警与危机管理当作自身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往往采取集体行动的方式。以次地区组织伊加特（IGAD）的早期预警与早期响应机制为蓝本，非盟于2009年正式建设了非洲大陆早期预警系统（Continental Early Warning System，

① 习近平：《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载《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

② 习近平：《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载《人民日报》2018年1月6日。

③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载《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

④ 习近平：《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2018年6月29日），载习近平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96~97页。

CEWS),但它更侧重于安全风险预警与响应,如聚焦草根层次的社会性冲突,对传统的军事或武装冲突则涉入不深,总体上可为非洲次区域发展韧性的提升贡献重要力量。<sup>①</sup>需要承认的是,非洲的风险预警意识和危机管理能力仍然相对较低,难以充分保障其可持续发展。从国家层次看,非洲各国往往对潜在风险不够敏感。例如,尽管埃塞俄比亚在进入21世纪后是“非洲崛起”的重要代表之一,但其民族联邦制、发展成果分配不均等风险始终未得到充分有效的系统性预防。这也正是埃塞俄比亚的发展在2012年梅莱斯总理逝世后面临严峻困难的深层原因之一。又如,当前非洲多国面临的债务风险与其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风险意识不足有关。在2011~2021年间,赞比亚、尼日利亚、南非等国的债务增长速度在大多数年份明显高于出口增长速度,经常出现出口负增长情况下仍大幅举债的现象,为其债务风险埋下了伏笔。<sup>②</sup>从大陆层次看,非洲经济发展自独立以来大起大落现象明显:既可能在短时间内由低迷转向高速发展,也可能发生断崖式坠落。独立头20年即1961~1980年间,非洲年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4.19%,但波动区间极大:既有从1967年(-1.23%)的低迷态势,迅速改善至1970年高达10.24%,创下这一时期的最高纪录;也有从1974年的7.92%急速掉头直下跌至1975年的-0.12%。在1960~2021年间,非洲经济增长速度的振动区间高达5500%,而全球平均振幅仅为1100%。<sup>③</sup>

中国建设独立的风险预警与管理能力,同非洲大陆更多发展集体性的风险预警与管控能力,有着广阔的经验交流互鉴空间。在全球化时代,多国合作共同防范现代化过程中的复合性风险,正呼吁中非加大风险预警与管理的互利合作与经验互鉴。

## 五 结论

纵观世界历史,东方国家在更长的时间里引领世界发展,西方国家在现

---

<sup>①</sup> Amandine Gnanguenon, “Pivoting to African Conflict Prevention? An Analysis of Continental and Regional Early Warning Systems”, *ISS Brief*, No. 3, 2021, pp. 1-8; 张春:《伊加特与非洲之角的安全治理》,载《西亚非洲》2016年第4期,第80~82页。

<sup>②</sup> 笔者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数据计算得出。

<sup>③</sup> 同上。

代化道路上的领先态势只是最近 400 余年的事情。就此而言，西方化绝对不是现代化的唯一有效路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体中国人民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走向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新的参照。

中非现代化经验交流互鉴的关键意义在于，双方不仅可有效推动中国式和非洲式现代化的共同发展，进一步丰富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更可进一步彰显多样性现代化道路背后的“发展共识—发展动力—发展韧性”共通性，为更多发展中国家独立迈向现代化提供借鉴与参考。发展共识凝聚、发展动力培育与发展韧性强化三者的良性循环，是包括中国和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迈向现代化的基本保障。发展共识的凝聚，不仅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抵制美欧的“教师爷”做法，更有助于实现发展中国家或“全球南方”的内部团结，促进国家认同的培育，缓解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紧张关系，全面提高治理能力；发展动力的培育，不仅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掌握面对外部资金的主动，更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内部各类问题的解决，特别是实现发展资源的自我再生产，由此而来的非零和性增量改革可在很大程度上缓解零和性存量改革导致的对抗和紧张，使可持续发展的安全和治理条件得以改善；发展韧性的强化，不仅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更为有效地应对外部性的人为和自然危机，更可强化对自身内部风险的预判和管理，也有助于凝聚国家发展共识，尽可能降低发展资源的无谓损耗，提升发展动能利用效率。通过中非现代化经验交流互鉴，推动发展共识、发展动能与发展韧性三要素的良性循环，有益于包括中国和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对独立自主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这里也需指出的是，共通性与多样性互为前提：共通性是多样性的基础，但惟有多样性才能凸显共通性。因此，包括中非在内的世界现代化经验交流互鉴，必须既尊重共通性与多样性，又不混同共通性与多样性，从而推动各国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最大程度地丰富人类发展道路的内涵。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